

大国的幻象

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王文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大国的幻象

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王文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 王文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5060-6258-9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2560 号

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DAGUO DE HUANXIANG; XINGZOU SHIJIE DE RIJI YU SIKAO)

作 者：王 文

责任编辑：徐 玲 龚 雪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0.5

字 数：292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258-9

定 价：42.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推荐序一 细读前进的中国与变化的世界

前外交部长 李肇星

中国和世界又古老又年轻，中国和世界又光彩夺目又难看准看清。世界在进步，国际经济、政治和舆论秩序又依然不合理，观察中国和世界要与时俱进，要在沸沸扬扬的议论中把握真相，主持公道，借鉴别人长处，又不受错误观点的诱惑。

本书承载的是一家之言，是我重视和比较喜欢的一家之言。

本书作者王文是比我年轻三十来岁的北大校友。后来居上是规律。我在外事战线待了四十九年，还有好多事看不明白。王文头脑清晰，视野开阔，天天都在观察研究世界大局，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做中外交流的桥梁。他有理想，肯实干，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聚沙成塔，终于有了这本《大国的幻象》。

本书中，文章涉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伊朗和欧洲诸国，几乎将现今国际热点一一收尽；字里行间有对他国长短、本国圆缺的思考，既不自卑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他忠于祖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立场出发，为祖国的和平发展提供着有效劳动；他辛苦，但幸福。在这一意义上，我和他又成为忘年同事。我愿意向他和各国年轻朋友学习。

2013年1月27日

自北京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去日内瓦南方中心途中

推荐序二 期待中国智库的明天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房宁

《环球时报》是我与王文结识的媒介。《环球时报》是当今中国最主要的媒体之一，不应忽视的是“中国”这两个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奇迹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能占有一席之地已经很了不起了，何况能引领社会潮流。一个多少显得稚嫩、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居然是这样一家媒体的“笔杆子”！这应算得上俗语里说的“成功人士”了。

人生有不同的境界，平安一生十分难得，能养家糊口也属不易，但谁不想有点作为呢？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可一辈子想有点作为又谈何容易！在人的短暂一生里如果能够和塑造民族精神搭上点边儿，那更算得上是三生有幸了！不管你服气不服气，《环球时报》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影响与塑造当今中华民族精神的媒体，特别是它的评论部分。一个“80后”能跻身这样一家媒体并有出色表现真是不同凡响。

王文在这样一家媒体中历练经年，站在中国舆论场的风口浪尖上的经历本身就是难得的一笔财富。这些年来如果是晚上10点以后手机铃声大作，那十有八九是《环球时报》评论部打来的，常常是王文在电话那端先恳切地说声抱歉，然后就探讨起那些最敏感和拿不准的政治话题。我常想这样的历练不成材也难呀！就在这样的时候，忽然有一次王文对我说想离开《环球时报》，离开媒体界，让我暗暗吃惊。为什么要这样呢？！老实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玩“急流勇退”是很不靠谱的事

情，很不理解王文的选择。

王文曾就是否离开媒体界数次咨询过我的意见，有两次甚至深谈到半夜。他谈到了人生的困惑，他认为自己在《环球时报》的“历史使命”已近结束，能做的都做了，怕以后变得“懈怠”，想从事能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岗位或职业。

2012年11月美国大选。我和王文应不同的邀请在同一时间分别赴美观摩大选。回来后，我发现我俩不约而同地随手记下了观察日记，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合作将日记公开发表，合著为《2012年美国大选观摩日记》。王文在美观选期间，访问了许多美国当代知名的战略家、思想家，这些人也大多是智库学者。在与这些大家的对谈中，王文显示出他的思想能力。媒体人的突出本领是观察和概括的能力，能够很好地领会和把握采访对象的思想意图和观念。王文作为一个成功的媒体人当然具备这种能力，但从与美国智库学者的对谈中，王文表现出自己对于采访话题中包含那些重大议题的独立思考，其中许多思考十分有深度。读着王文的观选日记，我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王文要是做个智库学者也许不错。过了没多久，王文告诉我，他想离开媒体转入智库工作。

智库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政策咨询和规划机构。智库造就了一个新的职业——智库学者。智库学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学者。智库以及智库学者以服务政府和企业为目标，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主，以产出政策、法律、体制机制，甚至制度为主。智库是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智库关注现实问题，以满足现实的社会需求为核心价值，智库研究以快速、简洁、实用为基本特征。现代智库基本的运作及其工作均无外乎三大方面：研究与咨询、传播与推广以及筹款。智库十分注重对自身机构、研究成果乃至学者的推广与传播，甚至借鉴商业营销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具有雄厚的资金。

参照智库的这些特点与需求，我忽然意识到，观察能力和思想能力皆一流的年轻学者王文，能够到一家智库工作也许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和

尝试。中国人民大学能选择这样一位有天赋和媒体从业背景的年轻学者可谓独具慧眼。

敏感、高效和简洁是智库研究的生命。智库要善于发现最具研究价值的重大问题，在众多现实问题和委托项目中确定最具价值的选题。同时，智库要以迅速和简洁的方式完成研究与咨询。现在王文把他近年来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大国的幻象》。从这本《大国的幻象》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会发现王文成为智库学者的天然优势。他会很细微、独到地观察每一个国际社会细节，提炼出那些新颖的角度，或者是切入点，而那些在机舱里完成的日记，又充分体现出王文的精力充沛、效率极高。我相信，他会将自己在媒体界多年练就的敏感、高效和简洁的优势，在人大重阳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王文一直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朋友曾调侃说，哪里有重要的学术会议，哪里就能见到王文。更难得的是，他会时常把一些不经意的思考撰写成学术评论，而这些文章又能摆脱纯学术研究的那些窠臼，文通字顺，通俗易懂，且富有浓厚的现实关怀。这种能力用于智库研究，可谓是一种天赋。比如这本书中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对中国话语权崛起的论述，等等，都是很不错的思考或是政策建议。

王文的传播与推广能力自然无需怀疑。当今中国优秀的思想者不少，但真正懂得传播并具有推广自己思想的能力的却不多。而在现代社会，在信息屏障已经形成的时代，传播能力对于突破信息相互屏蔽的障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看看美国，无论是老一代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还是新生代的福山、弗格森，他们都是善于“经营”自己思想的人，或创造新名词，或与媒体保持良好关系，都将传播与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说过：“我们在推销思想上花的钱，绝对和研究上花的一样多。”正是这种模式，使美国的思想常常能起到主导世界人心的作用。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国的幻象》想要表达的就是，中国人应突破美国学者经过“营销”后对中国人的思想束缚，然后呼唤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崛起。能说出这些，是需要勇气的。

如今王文又有一个令许多研究者羡慕的地方，就是拥有一个资金充沛的“人大重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只要校方、投资方支持可以持续，相信完全能够做出一番优异的成绩。

几个月来，我去过人大重阳数次，每去一次就发现有新变化。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人大重阳这样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智库。最近一次我对王文调侃道：现在我们许多研究机构，包括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也在向现代智库转型，但原有的学术机构向现代智库的转型就像是“旧城改造”，个中情况非常复杂，十分艰难。但你这儿就像是一次“浦东开发”。希望起点高、方向明、志存高远的人大重阳以及所有的新兴智库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能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这也算是我对王文、对人大重阳以及所有智库未来事业的一个祝福。

2013年4月30日于北京大有庄

推荐序三 “80后”的理论追求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丁刚

像我这样的77级文科生，大体上是在接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正统教育后，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这使得我们至今在观察和分析一些国内外问题时，仍不时会遭遇理论的尴尬。

我们曾经尝试过用西方的理论去观察和批判中国的现实，现在又试图用中国的现实去反驳西方的理论，理论的困乏成为今天很多人文学科发展的难点，也包括我的工作所涉及的国际关系学领域。我们很难摆脱已经在思维中扎了根的两套东西，苦于找不到理论的出路。

在与王文这一代人有更多接触之前，我以为这样的尴尬大概只有20世纪50年代或更早一两代人才会有。在《环球时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王文这代人虽然也会有理论困乏的感觉，但不同在于，他们是“思想解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更少受传统观念（也包括西方观念）的束缚。因此，他们对中国今天的发展现实有着不同于上一两代人的体验，因此表现出了更少思想负担的创新意愿。

2003年，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报社。两年后，受胡锡进总编辑之邀，到《环球时报》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参与了评论版的工作。王文当时是评论版的编辑，还有现在已经出国留学任教的查雯、张锋。他们都是80年生人，不像我们这些50后那样，知识结构一半是传统一半是西方，他们所接受的西方教育比我们更正统、更全面。王文就曾经在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多所高校学习。《环

球时报》的评论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和中外国际关系研究界最前沿的学者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理论动态。

更为重要的是，那段时间，中国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迅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上出现了一场围绕中国崛起展开的理论与观念的大交锋，甚至连英国丢了下水道的井盖，也要抱怨中国崛起太快，需要太多钢铁。比起那些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王文和他的编辑同事们更为直接地接触到了这种交锋，也直接进入了交锋。

他们有机会大量阅读两个阵营领先学者的理论与观点，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理论冲击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研究中，能够更客观地理解西方理论及其“边界”，同时又能根据中国的现实去突破西方理论的限制。一方面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在尝试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世界的事情。从王文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解读中国”与“解读世界”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读王文的文章，可以明显感到有一种追求蕴含其中。王文作为一家高度市场化的新闻媒体的编辑，必然要受读者阅读趋向和报纸定位的限制，但这从另一面，也让王文对中国的舆情有了更为直接的感受，也让他不同于一般在大学或研究单位工作的学者，也决定了王文的行文风格对读者会更具感染力。

中国的国际新闻近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总体上还比较浅薄，二手的多，自采的少，有深度的分析更少。这与记者的理论素质相关。这些年来不认真研究问题，不认真读书，随意对国际新闻作解读的报道和评论层出不穷，快速制造的评论和分析文章，也快速地被遗忘。王文的不同在于，他以“大量阅读+深入采访+不断思考+勤奋写作”的方式，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但却远比一些理论文章更能让我们触摸到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

作为记者，王文这些年来有机会走了很多国家，采访了不少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家。他在行走中观察，在采访中思考，使得这本书有了一个

连贯的主题：在对一些国际热点话题深入观察分析的基础上，透视西方理论的不足与缺陷，为建立新理论树立信心。王文这代人看来并不只是想挣脱西方那套东西的限制，而是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之前几代人一直抱有过的梦想。

要完成理论的建树，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批判的精神，更需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精神。王文的尝试还告诉我们，更重要的可能是，不能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学者身上。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们也在试图从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修正自己原有的理论，但最终的理论建立，恐怕还要靠我们自己。这也许是王文从媒体转到大学去工作的原因吧。

已经有近 10 年记者编辑经历的王文，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肯定会展现出他的不同所在，也期待这样的经历，能成为他未来在理论上取得更多建树的资本。

2013 年 4 月于曼谷

前言 西方印记下的成长与自觉

(一)

如果说1840年中国人呼吁“睁眼看世界”是为了超越自我心理的封锁，那么，现在我要再次呼吁“睁眼看世界”，为的是超越西方信息霸权对世界的蒙蔽。我之所以有这样浓厚的念头，完全源于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本能反应。渐渐地，这种本能变成了一些理性的文字沉淀。

对西方最早的本能反抗是在上大学的第一次旅途中。从义乌到兰州，必须在上海转车，老乡学长带我吃了人生第一次的肯德基，我花了几块钱买了一小杯土豆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西方舶来食品”的喜好是无以复加的。但那时，一听这小杯“东西”只是几毛钱的土豆做的，我本能地感叹，为什么西方人能把土豆搞得那么贵，赚了中国人那么多钱呢？学长一怔，惊叹于我这个“小屁孩”有那么高的“觉悟”。然后他又拍拍我肩：别想那么多，吃吧！

面对这些后殖民主义式的批判，中国人除了无奈与沉默之外，多年来都很难出现有实质意义的回应方式。即使在现在，中国号称“世界老二”，但数亿中国民众——不只是农民工——仍然是不公平国际经济链条中的最

底层。高档时装、运动鞋、家具、餐饮、各种高科技产品，比如几近“人手一机”的 iPhone、iPad，所有利润的大头总是被西方国家的幕后老板们赚取，小到农民工，中到白领，大到出口加工的大老板，其实赚得都是微薄的血汗钱。在后发劣势下，中华民族的复兴显得异常艰难与忍辱负重。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大部分舆论中，中国仍然是一个令人恐惧、充满威胁、不讲人权、文明落后的国家。

多数西方舆论对中国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发展的艰辛与困境缺乏基本的同情与尊重。对中国崛起，他们内心充满着焦虑。他们恐惧崛起的中国企业，抹黑崛起的中国军力，贬损崛起的“中国制造”，渲染中国人的品质恶劣或态度强硬……

不过，近些年来似乎有一些好转，欧美日韩媒体报道中国的数量越来越多，不少外国人也在试图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到过中国的老外也在帮助解释中国，国际舆论中还出现了越来越多肯定与客观的中国描述，甚至还有“捧杀”，但整体上，崛起的中国在欧美日韩媒体上的“口碑”仍是负面的、消极的居多。他们大多数对中国的指责都是从他们本国利益和立场出发的，大多数对中国的批判都是缺乏理解和苛刻的，尤其是在中国出现类似“3·14”“7·5”事件时，这些国家的媒体几乎都会一边倒地指责中国，庇护肇事者，字里行间都能嗅到西方人骨子里的傲慢、挑剔甚至歧视。

这种“坏毛病”还会弥漫在同样黄皮肤外国人之中。有次，一位新加坡媒体人说，还是让新加坡人教中国怎样搞民主吧？我回应：是啊，新加坡发展是挺不错的，中国从不回避向新加坡学习。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治理好一个北京朝阳区，不等于能治理好全中国。3 年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任《环球时报》评论组组长的我用了半个小时介绍中国媒体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在研讨会休息期间，一位日本老媒体人问我年龄后喃喃自语：像你这个年龄，在我们报社最多只是一个助理编辑。我笑答：您说得对，我的职称正好是助理编辑，但是中国成长迅速，需要我们这些助理们做一些你们高级编辑能够做的活。

在欧美国家，这种居高临下感更是明显。在维也纳，一位奥地利汉学教授几乎是从座位上跳起来，用食指指着演讲席中的我质问：“你们政府的禁令每天一麻袋一麻袋地向你们媒体传达，这个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我反应还算迅速，做了被在场中国人视为比较快速与得体的回复。（参见本书第三章的小节“在奥地利总理府的一场激辩”）在奥运年，一位瑞士媒体的副总编当着我的面讽刺道，中国媒体人一定没有欧洲媒体人更有责任感，否则中国媒体自由状况怎么会那么差呢？我差点跳起来：“欧洲记者可能只对商业负责，但中国记者要同时对国家、商业与社会负责。中国媒体为此付出的努力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次媒体交流会上，我问一位美国报纸出版人：“为什么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总是那么负面与消极，以至于让美国人根本无法了解世界的变化？美国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份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媒体，让美国人更全面地看世界？中国这样的媒体其实很多。”在场邀请方的主管在会议间歇期告诫我：“文，这里没有人关注中国发生了什么，你也不必那么致力于介绍你们中国的事情。”当时，我脑袋“轰”的一下，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出自美国人之口。我的第一反应是是否立即回国。接下来的半小时，我拒绝参加下一场讨论，直到邀请方派人来道歉。

或许有人不相信我的这些经历，也许还会有人以为我虚无的民族主义感太重，反应过激。但是，请相信我，正如我前文所说，那些都是我的本能反应。我是一个善于接受他人批评的人，每次对老外批判的回应后，我常常告诫自己，是不是过于“只分你我，不分对错”呢？是否在盲目排外呢？是否因为批判外国而成为了中国国内弊病的辩护者呢？许多时候我都担心掉入那样的陷阱。

但是更多时候，国际话语权的不平等又不断推着我必须向前走，让我只能顺着自己的心愿来做事，只要我是真诚的，是内心想说的，对得起自己良心的，那我就说，就写。

我常与一些学生说，中国崛起之路充满着与西方的博弈、摩擦甚至冲突，而在舆论场上，像我这样在《环球时报》评论版工作的人，就是中国

对外话语权竞争甚至“舆论战”中的排头兵。我所感觉与亲历的舆论厮杀甚至绞杀是真实的，我的回应与其说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民族道义，不如说是一种求自保、求生存、求尊严的条件反射。这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只有在外交、军事、贸易、知识产权、科技等一线工作的外事谈判人员才会有最本质的心理共振。

我遇到那些美国朋友、欧洲朋友、日本朋友大都是好人、善良的人。有一位美国外交官朋友，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一天，我给他讲那位逝去的年轻母亲用身躯护住自己的孩子，用最后一口气留下手机短信：孩子，如果你还活着，请记住，妈妈爱你。那时，这位魁梧的美国大汉眼泪喇地流了下来，我俩为灾区的遇难者唏嘘了很久，而他此前也收留了一位身有疾患的中国孤儿。但也正是这位美国外交官，很坦然地对我承认，早在1995年就开始一贯主张必须要对中国和平演变。

真是困惑与不解啊！现在早已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时代，冷战也早已结束，我们崇尚合作，反对你死我活式的竞争，但现实是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困境，西方总是重复着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境分歧与摩擦的选择偏好。人类智慧的贫瘠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那些都是性本善的好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却在国家利益、民族立场上会变得异常残酷与无情？我们完全能想象那些决定发动军事战争的西方政客们对待家人时的温情，就像虎毒不食子，但是却完全难以理解，和平解决怎么那么难呢？他们可以对乌干达、卢旺达大屠杀充耳不闻，却高举人权旗帜对叙利亚、伊朗大加指责？对他们来说，善意地尊重非西方的人群与国度，避免一些以民主自由为名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什么就是那么难以做到呢？对待中国这样寻求复兴权利的民族，为什么西方舆论常让人感受到其想置之于死地的味道呢？

更让我担忧的是，现在不少国人仍然在迷信西方，“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的做作几乎变成了“今世，我们是美国人”的呻吟。那种对西方的迷恋，使他们选择了对西方战争干涉手段与道德优越感的支持，对这种方式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保持沉默。他们认为美国天天大喊中国军力威胁是

一种国家危机感，当中国人警惕美国军力威胁时却是极端民族主义；他们认为美国生来就很民主，中国每次政治进步却都是“为了加强中共统治”；他们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但中国经济崩溃可能是必然的。或许，他们思考问题的立场首先是“美国是好的，中国是坏的”，那么，一切的结论就自然构成了某种知识的不平等与屈从。有时，这种屈从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已经被西方信息所“洗脑”了。

民主自由当然是好的价值，人类当然需要民主自由地生存、生活，但是，中国无法复制西方的模式与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模式，还是经济模式，或者是社会生活方式，两者的差异化不是故意为之，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直到近些年，当西方神话在许多中国人脑海中破灭时，仍有个别的中美中心校友在聚会时会批判我质疑西方的言论，他们认为西方那些价值仍是普世的，中国该如何向西方靠拢。两者的分歧有时候是那么深刻，以至于同学之间都以拍桌子的方式互不服输，最后只能以“咱还是别争了”作罢。有好友也会半开玩笑地说，好歹你也是受过美式教育的，怎么这么“反美”呢？在华盛顿，有常驻美国的中国朋友也很疑惑，美国那么好，你怎么还对它批判得那么厉害呢？

我的回答通常是，我丝毫不反美，即使面对那些亲密的美国朋友，我也从不回避这些观点。他们多数都会支持或理解，有不少还会跟我加入批判西方的聊天行列中。越来越多地接触欧美朋友后，我突然觉得，在中国，许多人比欧美人更能谅解欧美政府及其体制。我不相信互联网中所谓“带路党”式的指责，而是倾向于认为，那些朋友只是出于西方印记下成长的情感偏好，加之当前中国与西方在信息流中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中国媒体常常顺着西方媒体的逻辑讲述世界故事，久而久之，许多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感受就被蒙蔽了。

美国著名“中国通”兰普顿教授曾与我说，他常告诫他的学生，“即使你再讨厌中国，也需要明白，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有自己逻辑的。”中国有自己的逻辑，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逻辑，理解世界需要的不能只是一

种西方的逻辑，而需要有多角度的阐释。这种多元阐释一方面需要有超越西方逻辑的意识与勇气，另一方面也要有行走世界的机会与思考。这本《被西方蒙蔽的世界》^①（即《大国的幻象》）的问世，是我很幸运地拥有了以上两点的结晶。我内心充满感恩之情。

（二）

著书立说是每一个文字工作者的理想。但下决定想出版这本集子，始于2012年初的伊朗之行。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伊朗：一个被妖魔化的国度”中写到的，从起程踏入伊朗航空的第一步开始，我处处感受到个人成见与伊朗事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在我们的成见中，伊朗是一个沉闷的、保守的甚至专制的、邪恶的国家，但无论是在德黑兰街头，还是伊斯法罕的古桥上，我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欣欣向荣的社会、热情奔放的女子、民主且不设防的政府机构、受民众爱戴的国家领袖。在那篇“内贾德比奥巴马安全”一文中，我写道：

3年前，全世界人都羡慕奥巴马，这个黑人移民的后代如何实现“美国梦”，短短从政12年就当上了总统。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内贾德也是铁匠的儿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与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个“伊朗梦”吗？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内贾德49岁当上国家一把手，而奥巴马是47岁。

如果还要找两者的区别的话，或许还有：内贾德至今还是一个穷小子，他的存折里没有什么存款，他拒绝住进豪华的总统官邸、拒绝使用总统专机，“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竞选口号在他过去6年的任期内坚持得

^① 《被西方蒙蔽的世界》是本书最早想定的标题，但感觉失之片面，也无法概述本书的核心意思。但本前言的初稿是2012年春季最早想出书时写就。为了表达当时的想法，以及个人的心路历程，除文末的数段外，此前言的文字未做重大改动。——2013年3月31日注于三亚